

# 清初在华欧洲传教士与中国早期的海外留学

谭树林

(南京大学历史系 南京 210093)

[摘要]中国人到欧洲留学始于清初,发起者为在华欧洲传教士。这些留欧学生在海外学习西方语言和基督教理的同时,也向所到国家适时介绍有关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生活习俗,谱写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关键词]传教士,留学生,文化交流

## The European Missionary in China and the Early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early Qing Dynasty

**Abstract:** It began from early Qing Dynasty that the Chinese studied in Europe, the initiators were Europe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They learned the western languages and protestant rules.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introduced the Chinese thought, culture and living usages to the foreigner, They composed the new chapter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Key words:** the missionary, student abroad, cultural exchange

中国的早期留学,缘起于明清欧洲传教士来华。他们进入中国后,为了传教的便利,在积极发展教徒的同时,也很注意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明末迄至清初顺治、康熙在位时,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此时在华欧洲传教士较多,行动比较自由,但明末爆发的沈淮教难和康熙时杨光先教难驱逐欧洲传教士,此间教务惟赖中国籍司铎,再加上奉教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在保护传教士免遭迫害方面所起的作用,已使在华欧洲传教士感到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的必要性。康熙帝死后,雍正和乾隆时对传教活动作了较多的限制,洋教士们行动不便,致使传教活动难以开展,培养当地司铎愈显迫切。耶稣会第一位中国籍司铎郑玛诺即指出:“目前欲使当地教友能继续获领圣事,除派遣本国神父以外,别无他途可循。他们极易化装潜往各处,而欧洲人绝无可能。本会省会长对此事已有了解,但无人可遣,因过去不愿录用中国司铎。在此紧急关头,非本国司铎,不足以挽救危局”,并认

为“此事如不迅即付诸实施,已往传教事业将尽成泡影”<sup>①</sup>(p.197)。

但在培养中国籍司铎的方式上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在中国本地培养,这样可以减少花销;另一种认为在中国缺乏必要的语言和宗教环境,难以培养出合格的当地司铎,主张选取优秀者送往国外培养。后一种意见得到在华的法国耶稣会士的支持,他们首先采取行动,挑选若干年轻的中国教徒由专人负责,教以神学、拉丁文等课程,然后送往欧洲深造,学成后返回中国担任神职,由此揭开中国人早期海外留学的序幕。由于来华传教士以意大利、法国、葡萄牙人居多,再加上意大利罗马为教廷所在地,故大多数早期中国人海外留学集中于意大利和法国。

据载,第一位被耶稣会传教士派往欧洲留学的是郑玛诺,字惟言,广东香山澳人,生于1635年。他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与法国在华耶稣会士陆德神父相从甚密,郑玛诺即由其施洗。陆德神父也曾因竭力主张栽培当

地人士为司铎而被誉为“甚有远见”之人。1645年,陆德神父提议率领中国及安南北圻、南圻少年各一人赴罗马深造。法国耶稣会长以经济困难为由,只允许带郑玛诺一人前往。郑玛诺极富语言天才,在亚美尼亚六个月,即学会当地语言,“与当地人谈吐无异”。经过土耳其时遭蒙古人拘押,亦因其流利的亚美尼亚语获释。郑玛诺途中历经五年,1605年抵达罗马。在那里他正式加入耶稣会,进入罗马公学学习修辞学、哲学、物理学。毕业后在该校担任教职,教授拉丁文、希腊文法和拉丁希腊文学,“一个中国人在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心——罗马,著名的学校中教授希腊文学,在历史上,尚无先例”<sup>[1] (p. 192)</sup>,此举无疑会给中国人赢得较高声誉。1660年,郑玛诺继续攻读神学,1662年4月在葡萄牙候船期间曾到哥因勃拉大学就读。1666年4月,在受到葡王召见后,和其他14位传教士自里斯本扬帆东渡,10月到达果阿。由于时值杨光先教难,教士被逐,没能立即回国。待杨光先教案平息后,随同闵明我、恩里格到北京,从事传教活动,1673年5月死于肺癌。

郑玛诺之后,沈福宗是有据可考的我国最早留学生之一。他是江苏人,1680年随比利时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至欧洲,进入里斯本初学院学习,后在罗马公学肄业。1684年9月在法国逗留期间,于9月15日在凡尔赛宫晋见了法王路易十四,向他介绍了中国的一些习俗,如双亲故世后,即埋在平地上,礼节隆重,并须叩头,还表演了用毛笔书写,用筷子进餐等令法国人颇感新奇的技术,并出示了孔子像。沈福宗还介绍了有关中国汉字的知识:中国有8万多字,需要费时30多年才能记熟,显示了中国人记忆力之强和想象力之丰富。他还提到中国有很多学校和救济院。到英国时,沈福宗曾到牛津大学,拜会了东方学家夏德(Hyde),夏德遗书中即有与沈福宗的拉丁文通信及升官图、度量衡制以及汉文与拉丁文对照的应酬语等。他还曾前往意、德、英等国宫廷。沈福宗的访问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了欧洲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兴趣。法王路易十四本就支持派遣传

教士去中国,沈福宗法国之行对中国文化及习俗的介绍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也许正是沈福宗的到来,引起了路易十四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关注。在沈福宗到达法国的第二年,即1685年,路易十四即向中国派出六位精选的卓越数学家前往北京康熙宫廷。他们带来西方先进的医药、化学技术,为清廷绘制全国地图,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这一切,沈福宗的欧洲之行当功不可没。

法国巴黎外方传教士对培养中国籍司铎非常重视,黄嘉略即是他们培养的其中一位。黄嘉略是福建莆田人,其父在1651年由来华葡萄牙籍耶稣会士何大化主持施洗入教,取名黄保罗,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黄嘉略自幼在耶稣会士卜于善、梁弘仁的教育下学习基督教义和拉丁文。1702年,梁弘仁被巴黎外方传教会选为赴罗马专使,黄嘉略欣然随同前往,于1706年初到达巴黎,成为到法国留学并定居的惟一中国人。

黄嘉略的到来,引起法国上至国王贵族、下至黎庶之民的关注。法国王家学术总监比尼昂教士获悉黄嘉略到来,立即把他推荐给主管中国事务的海军大臣蓬夏特兰,建议聘用黄嘉略向法国人传授中文以及有关中国的知识。黄嘉略被任命为国王的中文翻译并协助整理王家图书馆收藏的中文书籍。

18世纪初,适值欧洲、尤其法国的“中国热”盛行,许多法国人都想结识黄嘉略借以了解有关中国的一切,因而与其交往的法国名人甚多。在这类交往中,黄嘉略向他们传播了有关中国的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大大增进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1709年至1713年,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巴黎居留期间与黄嘉略结识,两人过从甚密,向他了解到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也许正因为他亲自接触到来法的中国人,能现身了解中国的一切,因此,孟德斯鸠对中国的看法才与同时期的其他法国启蒙思想家不同。在《论法的精神》中,他一反18世纪欧洲对中国理想化的赞美与向往,而是流露出对中国的冷

峻态度。如许明龙先生所言,在孟德斯鸠以前,对中国的不同评价主要出现于天主教会不同修会教士之间,但自此以后,“法国的中国研究不再是一片颂扬之声,而是褒贬兼有,有时甚至还引起激烈的论争。不同看法交锋的结果,把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引向更加全面、更加深刻”<sup>[2]</sup>。

傅尔蒙亦是与黄嘉略交往,且深受其影响的法国学者。他原是阿拉伯文教授,对汉字可以说目不识丁。他受比尼昂之托,在协助黄嘉略编写《汉语语法》和《汉法词典》的过程中,接受了有关中国的知识,以后刻苦自学,从而成为法国非教会人士中的第一代汉学家之一。方豪在谈到法国汉学的发展时说:“然汉学发扬光大时期,应始于法人傅尔蒙之刊出《中国文典》。……法国初期汉学者,皆出其门,称近代汉学之始祖。”<sup>[3](p.13)</sup>法国汉学一代名家弗雷莱也是因协助黄嘉略而与汉学结缘,并成为汉学研究中的佼佼者。他的汉语、中国历史和中国天文学的研究,在当时均属一流,在法国汉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天文学家德里尔、植物学家茹西欧、东方学家加朗等,均与黄嘉略有过交往。尽管黄嘉略向他们提供的有关中国的信息有些是不系统、不完整,甚至不够准确的,但较之处于礼仪之争的传教士们带有倾向性的评述,无疑更具客观性和真实性,既有助于深刻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认识,又丰富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

继黄嘉略之后,耶稣会士吴君带领五名中国青少年前往法国留学,在获得司铎职位后,分别于1750年和1754年返回中国。1751年,两位北京青年杨德望、高类思和另一陈姓的青年在法国传教士卜日生带领下前往欧洲留学。此前,杨德望和高类思已在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的指导下,学习了四年基督教礼仪、拉丁文以及中文。1751年7月他们离开北京,于1752年7月抵达法国,进入设在拉弗莱什的教会学校学习。他们先是用三年时间学习法文,然后又学习逻辑学和神学。1759年3月来到巴黎,进入耶稣会创办的一所初级学校。在此修

业期满后,又进入巴黎一所属于遣使会的神学院深造,1763年5月28日,两人同时被祝圣为司铎。

在华耶稣会派杨德望、高类思到法国学习的目的,是将他们培养成合格的神职人员,返华后可以比洋教士更方便地从事传教活动。因此,在祝圣为司铎后,高类思、杨德望即准备回国。在巴黎逗留期间,前来拜访的法国人络绎不绝,其中多数人是与他们探讨有关中国问题的,这些问题范围很广,除了中国的一般情况外,还包括诸如中国人是否为埃及人的后裔,中国文字是否起源于埃及文字等这类当时极为热门的学术问题。著名汉学家德经和奥特雷曾专门就这类问题与高类思、杨德望交换了意见。高类思、杨德望与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杜尔阁交往甚密,当得知二人即将回国时,杜尔阁召见了高类思、杨德望二人,并向他们提出52个问题,要他们回国后调查研究给以答复。这52个问题大体分为四类:第一,关于财富、土地分配、耕作等共30条;第二,关于技术(造纸、印刷、织物)共15条;第三,关于博物(地质、陶土、纸、墨、茶叶)4条;第四,关于历史共3条。此外,杜尔阁还赠送给他们一批书籍,其中包括法国生物学家布封的《自然史》等名著。

回国前,法国内阁大臣贝尔坦派人送给高类思、杨德望一封长达22页的信,希望二人能向他提供有关中国的以下信息:第一类“公法”,包括历史、宗教、政治等,为便于进行比较,给他们随带三份材料,分别介绍了欧洲对世界起源、洪水日期以及最早的人群等问题上的见解;第二类“私法”,主要是中国的法律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第三类是关于各种制造工艺和技术的问题。贝尔坦还要求高、杨二人在回答这些问题或提供其他信息时,尽量附寄与之有关的实物或样品,使法国人能比较准确地了解和掌握文字所能表达的内容。

1765年1月,高类思、杨德望启程回国,临行,法国政府赠送了工艺品、新式利器、装饰玻璃、陶器、手提印刷机、电气机器、望远镜、暗箱、显微镜、金表等礼品,法王路易十五还每年

给每人 1200 铤。1766 年 1 月,二人回到北京。对贝尔坦所提问题,他们陆续给他寄出许多实物和信件。翻检他们的来往信件可知,杨德望给贝尔坦寄出过 74 种中药材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介绍了草药在中国的使用;高类思则向他提供了有关中国政府设立义仓赈济灾民的材料<sup>[4](p. 360)</sup>。高类思、杨德望还与在华法国传教士合作写成《中国兵法论》、《谷保存法》、《中国古代论》等论文,来答复上述杜尔阁所提的四类问题。杜尔阁把高、杨二人的答复分别以《向两位中国人提出的有关中国的问题》和《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为题发表,成为法国重农学派的重要著作。英国自由派大师亚当·斯密交游法国时,曾与杜尔阁交往,其巨著《国富论》中的许多观点都上承杜尔阁及重农学派。及到清末,《国富论》被译成中文,其理论又输入中国,影响了中国知识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

早期中国留学史上,留学规模较大的当属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 1732 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创办的中国学院,又称文华书院。马国贤是教廷传信部直辖的在华传教士,1710 年由罗马教皇克莱门十一世派遣来华。1710 年冬,奉诏以画家身份入宫侍奉,其雕琢绘塑之技,颇为康熙帝所重。除了给康熙帝作画外,作为一位传教士,他还忙于传教,尤其“对于培植中国本籍圣职人员,较其他任何西洋教士尤为致力”<sup>[11](p. 334)</sup>。他感到“这辽阔的土地上多么缺少工作人员(指传教士),而欧洲不能为之提供”,特别是他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欧洲传教士如何众多,如何热心,终究因为语言上的巨大障碍,而不能产生令人满意的传教效果。”<sup>[5]</sup>因此,马国贤说自己在中国的最高愿望是“建立一所学校”,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收容若干中国青年,施以基督教教育。但此举遭到其他传教士的反对,尤其是中国人对此不理解,甚至充满了恶意。这使他认识到“在中国计划筹办学校,肯定是不会昌盛的。”<sup>[5]</sup>他只好放弃了在中国办学的计划。1723 年雍正登基后,马国贤称病回国,此时他仍没有放弃培养中国

圣职人员的愿望,临行带走谷文耀、殷若望、黄巴桐、吴露爵等四名中国青少年同行,1724 年抵达意大利。

回国后,马国贤向罗马教皇和意大利国王游说,经过八年努力,终于获准在 1732 年成立那不勒斯中国学院,最初以专收中国留学生为目标,后来规定凡有志来远东传教的西方人与土耳其人均可入院学习。那不勒斯中国学院学生由罗马教廷传信部赡养,毕业由教廷授予学位。中国学院从 1732 年开办,到 1868 年 12 月 27 日被意大利政府没收,当时正在此学习的河南人时炳文、湖南人唐福元、袁永隆遂转入传信部大学学习。在其存在的 136 年中,共有中国学生 106 人,意大利学生 191 人,土耳其学生 67 人。中国留学生中姓名可考者有<sup>[6]</sup>吴露爵、赵多明、严宽仁、汪振享、刘安德、唐逢泰、殷苦望、张蕴华、阎玉亭、沈静渔、十三陆霞山、黄廷璋。以上仅为在那不勒斯中国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极小部分,他们大部分人经过学习后升任司铎,返回中国后从事传教工作,基本上实现了马国贤创立那不勒斯中国学院培养中国籍司铎的目的。然而,该院虽名为中国学院,但其宗旨不仅培养中国学生,凡有志远东传教者及土耳其人皆能入学。为了使学院学生能胜任远东及中国传教,对入院学生、尤其是意大利和土耳其学生,教授他们有关中国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知识,在欧洲最早开设中文教育,促进了他们对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和认识。1792 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由于缺少中文翻译人才,只好从那不勒斯中国学院聘请了两名通晓拉丁意大利语的中国留学生做翻译,此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sup>[7](p. 118)</sup>。故而,无论从欧洲汉学课程的开设,还是早期中国人赴欧留学来讲,那不勒斯中国学院都不失为一种前驱活动。它所培养的学生日后多为神职人员,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一定影响,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也应予以正视。

早期到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皆为在华传教会所派,就此而言,容闳可谓早期中国留学生

的殿军,又是近代留学教育的拓荒者和奠基人。容闳,1828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35年随父去澳门,经父亲朋友介绍,进入德国传教士郭实猎夫人创办的西塾学习,1841年后转入由布朗担任校长的马礼逊学堂。1846年9月,布朗回美国休假,容闳和另两名中国学生黄胜、黄宽有幸赴美深造,学费由英美人士提供。他们首先到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学习。一年后,黄胜因身体不佳辍学回国。容闳和黄宽坚持读完全部课程,于184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黄宽到英国留学,后获得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857年回国后长期在广州行医,成为久负盛名的外科医生。容闳留在美国报考耶鲁大学,布朗等人打算帮助容闳申请孟松学校董事会为贫苦学生设立的奖学金,但必须签署书保证毕业后充当传教士。容闳认为自己学习的目的在于为中国人谋取幸福,拒绝接受。后来布朗为容闳从佐治亚州妇女会得到赞助,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在那里,他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优秀,“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sup>[8]</sup>(p.210)。1854年,容闳获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他是第一个在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

容闳在留学期间,目睹了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给美国社会带来日新月异的进步,深感欲使中国富强,就应尽快选送优秀青年到美国或欧洲留学,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成为文明富强之邦。1854年11月回国后,容闳即图谋实施其教育思想,他曾寄希望于太平天国,但最终因太平天国军事失利而使其教育主张无法实施。此后,他从洋务派那儿寻求支持,1863年结识曾国藩、丁日昌,力陈留学对“求强”的意义,1871年,终于促成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上奏《选派聪颖子弟赴美习艺并酌议章程》,“章程”分析了派幼童赴美留学的条件。清政府很快批准了这一计划,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任命陈兰彬和容闳为正、副监督。

正是来华传教士开创的中国早期留学的前驱之举,才有容闳赴美留学,进而促成了中

国幼童赴美留学。从此,赴境外留学之风开始兴盛,形式亦趋多样化,不仅有政府公派,19世纪后,自费留学渐成风尚。不仅留学欧美,甲午战争后留学日本也蔚为大观。

早期中国留学生为在华传教士派遣,所需经费由传教会提供,留学的目的是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神职人员。然而,他们在海外学习西方语言和基督教知识的同时,也向所到国家的人们适时介绍有关中国的一切,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学西渐的进程。总之,留学生谱写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他们在学习外国的同时,也带去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生活习俗。留学生在国外的活动向西方揭开了遮盖着中国人文化、生活的重重幕布的一角,使他们近距离地,较为真切地感受中国、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同时留学生也向封闭已久的国人打开了洞悉西方文明的窗户。所以,留学既是外来文化的输入,也是民族文化的输出。可以这样说,来华欧洲传教士开启的中国的早期留学之旅,客观上对中西文化交流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1年10月30日

【作者简介】谭树林,男,1967年生,山东临沂市人,现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从事中外关系及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责任编辑 倪金荣】

参考文献:

- [1]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8年。
- [2]许明龙:《中法文化交流的先驱黄嘉略——一位被埋没二百多年的文化使者》。《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3期。
- [3]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岳麓书社,1987年。
- [4]许明龙:《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东方出版社,1994年。
- [5]马国贤:《靖宫十三年——马国贤神甫回忆录》(八),刘晓明编译,紫禁城,1990年第2期。
- [6]方豪:《中国初期留学史拾遗》,北平《磐石杂志》第4卷第2期。
- [7]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上海书店,1989年。
- [8]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